

●朱天俊

一代宗师 风范长存 ——回忆刘国钧先生在北大的日子

摘要 刘国钧先生在北京大学工作近30年。他一直在为北大图书馆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奔忙,为该系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先生学贯中西,著述成果丰硕,不愧为我国图书馆学界之一代宗师。参考文献14。

关键词 刘国钧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 图书馆目录 图书分类法 中国书史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As a professor, Liu Guojun had worked in Peking University for nearly 30 years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14 refs.

KEY WORDS Liu Guojun. 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History of books in China.

CLASS NUMBER G250

1980年7月,我从东北巡回辅导函授学员归来,惊悉刘国钧先生于6月27日溘然长逝,感到十分悲痛。

先生是1951年夏秋之交从兰州调京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的。这一年正是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获准改为图书馆学系本科建制的一年。

这一年8月,我考入北大图书馆学系。先生为我们51级同学讲授了图书馆学概论、图书编目法、图书分类法等几门专业基础课。毕业前,先生虽已50多岁,他还亲自带领全班20余名同学住宿城里北大旧址红楼,在北京图书馆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毕业实习。从与馆方商订实习计划到批阅实习日记、实习报告,事必躬亲。在先生的教导下,我对图书馆,从感性到理性有了新的认识,具有了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并为我大学毕业后留系任教,打下了较好的基础。1962年,先生任系主任后,我也兼任系教学秘书。先生毕生勤奋,治学严谨,他在学术和教学领域中孜孜不倦、循循善诱的精神,影响了全系师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先生到系后,从根本上改变了系的面貌,对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时光流逝,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教学的魅力,经常萦回脑际。

1 来北大最初的几年

先生来系后,首先开设的是图书馆学概论课程。

先生根据图书、人员、设备、方法是组成图书馆四要素的观点,提出“广义的图书馆学应当包括上述四方面,狭义的只指上面的第四项,就是关于图书馆方法的研究,这也是本课程的范围。但是与方法有关而为研究方法时所不可不知道的,也将略为涉及”。课程内容基本来源于1934年先生所著《图书馆学要旨》,但《讲授提纲》中已经注意提出图书馆学研究,应当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作为基础,此其一;已从《苏联图书馆事业概况》一书内吸收了列宁关于图书馆论述,此其二;已列两章分别概述古今中外图书馆事业与中西图书制度之发展,此其三。如果说,《图书馆学要旨》是先生图书馆学说的初创阶段,那么图书馆学概论课的内容,则是先生图书馆学理论走向改造阶段。到1957年,先生发表了《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文中提出了有别于四要素的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五要素。在讨论会上先生又说:“区分为五要素并不等于孤立地对待每一项要素,这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并不是研究内容问题。因此不能据此断定这是将图书馆事业分割开了。”先生确认“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文中还论证了“图书馆学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运用着科学研究的方法,并且像一切科学一样有改造现实的

任务,因此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由此可见,先生的视野已从研究单个图书馆扩展到整个图书馆事业,这与《讲授提纲》所提出的“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科学”,已有质的飞跃。至此,标志着先生的图书馆学思想已趋于成熟。

1952年先生又为51级开设了图书编目法与图书分类法两门专业基础课。先生认为:“分类以书之内容为主,编目以书之实质为主。”[※]编目乃图书著录之法,非论图书部居之法。”当时分别开设这两门课程,是很自然的。先生讲课时,理论寓于方法中,举例典型具体。同学们学会了图书编目、分类技能,而且也认识到这些平凡工作的重要意义。随着教学计划的修订,先生参考前苏联图书馆学院课程设置方案,将这两门课于1955年合并为图书馆目录一课进行教学,并于1957年以先生为主,与陈绍业、王凤翥先生合编《图书馆目录》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行销全国。

《图书馆目录》22章,以图书馆目录的性质、意义与作用开篇,以图书馆目录制度、图书馆的编目工作结束,系统地讲述了图书著录、图书分类、图书标引以及以反映图书馆藏书的书名、著者、分类、主题等目录的编制原理与方法。由此反映了图书馆目录的内在连贯性与完整性,有着严密的逻辑性。这部教材融合了先生1953年所写的《图书怎样分类》的精髓,先生深厚的传统目录学素养,在本书中也得到了极佳运用。

30年代,有些学者,如姚名达在《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二书中,将西方传入的编目理论与方法亦归属目录学。《图书馆目录》的问世,说明这一部分知识似应从目录学中分离出来。正如先生在本书“前言”所记,图书馆目录是图书馆学组成部分之一。这既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涵,又理清了图书馆学与目录学两门学科之间的区别与关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课程本身的整合。

1955年秋,我又听了先生新开的中国书史课程。这是先生在受到苏联专家雷塔娅来系介绍苏联图书馆学院教学计划与图书馆学、目录学、图书史等课教学大纲的启示后开设的一门新课。在此之前,先生已编著《可爱的中国书》、《中国书的故事》。开课时又吸取有关中国书史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讲述中国图书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和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本课的开设,拓展本专业研究的领域,激发了一些同学钻研书史的兴趣与热情。

先生在中国书史讲稿的基础上,编著《中国书史简编》,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先生以崭新的视角,独特的构思,深入细致地讲述了中国图书的起源、形成、制度、作用及其影响。此后,先生又编著《中国的印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中国古代书籍史话》(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书史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建立起来了。随着《中国书的故事》英译本(外文出版社1958年翻译出版、1985年再版)、《中国书史简编》日译本(松见弘道译,日本理想社1963年出版)相继问世,先生的中国书史研究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2 60年代以后

1960年春,根据函授教学的需要,先生又承担起为函授生开设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课程。先生指出:“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是一门崭新的课程,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此之前,只有一点年表式的文章和一些专题的、片断的论文,没有系统的著作。因此,没有现成可用的教材,一切要从头做起。这门课程的学习只能是一面学习,一面开荒。”教学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先生认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是研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研究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目是要通晓,掌握这个过程的情况并发现其规律,从而作为进一步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指导。”[※]研究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必须首先明确方法论上几个主要的问题:①古今问题。不能有古无今,也不能有今无古,既不应是古非今,也不应否定过去的一切,而必须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②现象与规律问题。研究历史不应只通晓、掌握图书馆事业的现象,而应该注意发现其中的规律。应该从现象中分析出规律而不应用现象来阐述或证明某些现成的规律。当然,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研究的目前阶段,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但这必须是我们的研究方向。③理论与资料问题。堆砌资料不能代替理论,但只有理论而无资料也只是空论,理论应建筑于资料之上。占有资料、分析资料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④批判与继承问题。既不能割断历史,有今无古,也不应不加批判,兼收并蓄。对于过去既不应全盘接收,也不应全盘否定。必须汲其精华,弃其糟粕。其标准就是要有利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建设。”这些阐述,对于学习与研究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确是纲领性的意见,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

基于这样认识,先生编写了《图书馆事业史大

纲》,共3编23章,扼要地讲述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萌芽、封建社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近代封建藏书楼的没落、新式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建国以来图书馆事业的恢复、发展与繁荣。另选编52篇论文、资料印成《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参考资料》,供函授生阅读。

1962年,先生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时,原拟编写讲义古代、近代、现代3编。由于系务及校外社会活动繁忙,只编写了第一编古代图书馆事业,称之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史》(1962年铅印本)。先生联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背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官家藏书的兴衰与藏书机构的工作特点,私家藏书发展与私家藏书目录的价值,书院藏书始末及其作用。书稿最后介绍了清代藏书家孙庆增的《藏书纪要》与曹溶的《流通古书约》。先生认为这两部著作虽是私家藏书工作经验的记录,但后者已论述藏书的流通,预示着近代图书馆的诞生与中国图书馆学的发生。

1963年,先生又为高年级同学开设了百年欧美重要图书分类法评介专题讲座,可视为图书分类理论与方法的补充与深入。根据我的听课笔记,先生首先简介了前苏联著名的图书馆学家E·И沙穆林所著《图书分类法史略(第二卷)》,这是一部以图书分类体系发展的观点,评述从180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英、美、比、意、德、俄以及苏联等国家的各种图书分类法的专著。然后再重点介绍与评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又比较流行的7种综合性图书分类法: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DC或DDC,1876)、克特《展开制图书分类法》(EC,1891)、《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LC,1901)、《通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或译《国际十进制分类法》(UDC,1905)、布朗《主题图书分类法》(SC,1906)、布立斯《书目用图书分类法》(BC,1935)以及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所编在西方国家发生较大影响的《冒号制图书分类法》(CC,1933)。本专题讲授大大拓宽了同学们的专业视野,大大丰富了图书分类的理论、历史与方法的知识。1964年,先生在专题讲授讲稿的基础上,经过补充、修订,写成《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专著,1980年10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中,先生以较大的篇幅,从每一分类法发展经过、基本原理、类表结构、分类实践等方面,更为具体深刻地介绍与剖析了DC、EC、LC、UDC、SC、CC、BC7部图书分类法,并作出

中肯的评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先生在书中关于图书分类法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社会性质的制约、学术发展变化与图书本身多样化影响的论述;关于哲学知识体系、科学学科划分以及过去时代图书分类法体系的影响是现代图书分类法类目与体系的材料来源的论述,从理论上阐明了图书分类法的内容与本质。本书结束语中,先生指出7种图书分类法先后出现,既“为总结经验提供了丰富资料,促进图书分类日益深入”,同时“图书分类法从一种实用技能逐渐提高到一门有理论、有方法的科学。图书分类的理论,从一种具体分类表的说明逐渐成为分类规律的探讨”。言简意赅,思想多么深刻!本书虽出版于20年前,至今在国内仍是一部少有的学术著作。无论是考察图书分类法,或编制图书分类法,或从事图书分类教学与研究,它都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3 最后的岁月

“文革”中,先生虽遭受到极大的冲击与伤害,但仍然关注着国外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进展,专心致志地开始了图书馆现代化的探索。

1972年写成《1965年以来美欧图书馆学论文简介》,重点报导了国外图书馆界合作与协调、科技情报工作动向,图书馆工作自动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图书馆教育的新变化等方面的进展与趋势。

1975年发表《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文中就“马尔克”一词的概念、美国国会图书馆实施马尔克计划的历史背景和组织、马尔克系统、马尔克记录款式、款式识字、成套字符的应用、回溯转换计划、马尔克计划的发展和前景等问题,逐一作了详尽的介绍与述说。先生预感“图书馆工作全盘自动化,就现在科学技术说,实现的日子不会太远”。2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言。同时先生又指出,“决定事物用途的最初和最终的力量是人,而不是电子计算机”。一语点破了问题的实质,给人以启示。

1975年至1976年编译的《马尔克款式说明书资料汇译》(油印本),是先生译介到我国的有关美国国会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一套机读目录编制规则的资料书。据《汇译·译者引言》所述,美国国会图书馆已出版马尔克款式有五种。先生只将见到的单本书籍、连续出版物、地图三种,省略重复之处,汇译成册,并就中文图书目录汉文编码,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探讨。

1977年撰写《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是先生依据当时所见到的国内外有关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资料所产生的个人设想,目的也在于以此推动我国图书馆目录工作的自动化。

三篇著译反映了先生晚年以非凡的毅力,对学术执著的追求,始终不忘引进国外新技术,推动我国图书馆现代化的进步。

4 人生之路

4.1 视教学为生命,教书育人

早在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与东南大学合组图书馆学暑期学校,先生即执教于该校,开始了他的图书馆学教学生涯(马宗荣《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研究》,《学艺杂志》第10卷第3、5、7期)。此后又在金陵大学多次讲授图书馆学。

1951年来北大后,这是先生从事图书馆教育时间最长、业绩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一贯重视调研图书馆界对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的要求,定期召开座谈会,倾听师生对教学的意见。不断修订或调整教学计划,研究筹建新课,俄文图书编目法就是在先生的提议和具体帮助下开讲的;科技情报工作专题讲授也是由先生提出并聘请袁翰青先生来系讲授的。1964年先生为系申请招收了中国目录学史、图书分类两名硕士研究生,开创我国图书馆教育设置研究生的先例。60年代上半期,先生已60多岁高龄,但他不因年迈、系务繁忙和社会活动多而脱离或减轻教学任务。他先后为学生开出五门课、一个专题讲授。先生备课认真,讲课深入浅出,紧密联系实际,内容充实,逻辑性强,深受历届学生的尊敬。

先生也十分关注在职图书馆人员的业务提高。1956年他编写《图书馆员基本业务知识讲话》,连载于《图书馆工作》1956年第2~6期,深受广大馆员欢迎。1957年他为文化部图书馆处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讲课,并编印讲稿《关于图书馆目录的几个问题》。1961年为北京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图书馆红专大学讲课,也编印了《图书馆编目基本知识讲授提纲》。

先生经常告诫我们,教员首先要教好课,全身心投入教学。不热心教学或不认真教课,不是一个称职的教员。先生的教导以及他忠诚于图书馆教育,视教学为生命的风范,永远影响与激励我在教学岗位上努力工作。

4.2 理论联系实际,潜心治学

先生教学成绩卓著,源于他从不脱离图书馆工作实际,以潜心治学为己任。先生研究的课题总是中国图书馆事业领域内迫切需要回答或解决的问题。20年代初正是现代图书馆初步兴起之时,1921年他发表了《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20年代中期,先生深感图书馆分类、编目工作亟待改进。1926年他在《四库分类法之研究》一文中,详析四部分类法的源流,指出此法已适应不了新旧书籍之分类。1927年在《中国现在图书分类法之问题》一文中,又论证了“新旧并行制窒碍殊多,而统一制较为便利”。并于1929年博采中外分类法之长,费时三年编制完成《中国图书分类法》,可谓当时国内诸多新编图书分类法之佼佼者,为不少图书馆使用。1928年先生发表《图书目录略说》,他通过评析中西目录学家有关目录的论述,指出“图书馆中之编目,其目的固在于便检查,其范围亦以所藏者为限,其详略则以图书馆之性质为衡”。随后于1930年编订《中国编目条例》,使图书著录有规可循,在图书馆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50年代初先生兼任北京图书馆顾问,每周去北京图书馆一天,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分编方面的疑难问题。他参加了一系列有关编制新图书分类法的学术研讨会,他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为多种图书分类法编委会所参考采纳。1956年,他参加了制订《(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图书馆学组工作,强调图书馆学研究首先要考虑如何提高图书馆工作质量。《规划》中要兼顾理论、历史与方法的研究。他又提出编写优秀教材是当务之急,因而列入《规划》中。1957年他在全系师生座谈会上,就培养目标及教学中若干问题提出的意见,促进了各级领导对图书馆教育及我系建设的重视与支持(《图书馆教育走向何方?——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师生座谈会》)。1964年他参加了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参观学习第一组,赴陕、川、鄂、豫考察图书馆事业。正是由于先生了解图书馆界实际状况,因而他在50、60年代写的论文,选题准确,如什么是图书馆基本功、分类法与标题法在检索工作的应用等等,都能及时回答与解决现实问题。

4.3 学贯中外,开拓进取

先生学贯中外,兼知古今,博览群书,谙练文献。他精通中西哲学,文史造诣深,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研究。

(下转第70页)

展方向和重点应该是硕士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这种向高层次教育的发展方向将趋近于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的现有模式。实践证明,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的现有模式不仅可资借鉴,而且也是内地图书馆学教育未来发展的正确出路。

3.3 奋力前进

要实现图书馆学教育的重点转移,笔者以为,目前的关键在于克服研究生培养点已足够的思想,通过各种方式改变高层决策者已形成的图书馆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不需要再设立的认识,然后,力促在未来的专业布点中尽可能地多设立图书馆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使图书馆学博士点和硕士点达到相当的规模,以避免图书馆学专业在未来遭受裁减或合并的危险。

3.4 发展内涵

目前,本科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在这种趋势下,图书馆学本科的专业课程在数量上只会减少,不会有大的增长。因此,如何保持最低限度的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提高这些有限的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教育质量。而要提高图书馆学专

业核心课程的教育质量,其关键在于发展图书馆学专业核心课程的内涵,使其真正符合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只有这样,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才不至于在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影响下失去其专业特色。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1999年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2 程焕文.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图书馆学信息学教育之发展与展望.21世纪中文图书馆学术会议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9
- 3 程焕文.危机种种——图书馆学信息学教育札记.图书馆,2000(1)
- 4 程焕文.盲区种种——信息学研究札记.图书馆,1996(5)
- 5 程焕文.误区种种——图书馆学札记.图书馆,1995(1)

程焕文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广东图书馆学会理事长.通讯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邮编510275。

(来稿时间:2000-07-27)

(上接第62页)

先生早年撰写的《西汉时代道教概说》、《后汉译经录》、《三国佛典录》、《老子王弼注校记》、《老子神话考略》,这是先生利用宗教文献研究佛教、道教经典及其思想的传播。先生撰写的《曹操与其时代之思想》、《建安时代之政治思想》、《建安时代之人生观——魏晋思想散记》,则是在40年代对魏晋乃至六朝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抗战期间,先生筹组西北图书馆。他十分注意西北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他提出建立西北地方文献专藏的理论与业务实践,在当时具有开拓的精神。在今天西部大开发中,也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50年代初,先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得到巨大进步。从此他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研究学术,使他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追思先生的一生与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学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洞见卓识、开拓进取、质朴无华以及他对事业的无私奉献,完满地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刘国钧.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 2 刘国钧.中国图书编目条例.中华图书馆协会,1930
- 3 刘国钧.图书馆学要旨.北京:中华书局,1934
- 4 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修订版).金陵大学图书馆,1936
- 5 刘国钧.图书馆学概论讲授提纲.北大图书馆学系,1951
- 6 刘国钧.图书怎样分类.上海:开明书店,1953
- 7 刘国钧.中国书的故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 8 刘国钧等.图书馆目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 9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 10 刘国钧.图书馆事业史大纲.北大图书馆学系,1960
- 11 刘国钧.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学习指导书.北大图书馆学系,1960
- 12 刘国钧.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北大图书馆学系,1962
- 13 朱天俊.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的讨论.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3)
- 14 朱天俊.图书馆教育走向何方——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师生座谈会.图书馆工作,1957(7)

朱天俊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通讯地址:北京中关村.邮编100871。(来稿时间:2000-08-24)